

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许 钧 ◎ 总主编

西儒经注中的 经义重构

理雅各《关雎》注疏话语研究

胡美馨 ◎ 著

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许 钧 ◎ 总主编

西儒经注中的 经义重构

理雅各《关雎》注疏话语研究

胡美馨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儒经注中的经义重构：理雅各《关雎》注疏话语研究 / 胡美馨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10

(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308-18188-4

I. ①西… II. ①胡…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7973 号



西儒经注中的经义重构——理雅各《关雎》注疏话语研究

胡美馨 著

出品人 鲁东明

总编辑 袁亚春

丛书策划 张琛 包灵灵

责任编辑 黄静芬

责任校对 虞雪芬

封面设计 程晨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45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188-4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中华译学馆宣言宗旨与

以中华为根译与学旨重

弘扬优秀文化促进中外交流

拓展精神疆域驱动思想创新

丁酉年冬月许钧德罗钢秉书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礼’
话语研究”(10YJAZH028)

总序

改革开放前后的一个时期，中国译界学人对翻译的思考大多基于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数次翻译高潮的考量与探讨。简言之，主要是对佛学译介、西学东渐与文学译介的主体、活动及结果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转向，让我们不断拓展视野，对影响译介活动的诸要素及翻译之为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考察一国以往翻译之活动，必与该国的文化语境、民族兴亡和社会发展等诸维度相联系。三十多年来，国内译学界对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与“五四”前后的文学译介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西古今关系发生了变化，其态势从总体上看，可以说与“五四”前后的情形完全相反：中西古今关系之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化。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中，新世纪的中西关系，出现了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诉求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输出为特征的新态势；而古今之变，则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中对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化传统与精华有了新的认识，完全不同于“五四”前后与“旧世界”和文化传

统的彻底决裂与革命。于是,就我们译学界而言,对翻译的思考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对翻译思考的路径和维度也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变化之一,涉及中西,便是由西学东渐转向中国文化“走出去”,呈东学西传之趋势。变化之二,涉及古今,便是从与“旧世界”的根本决裂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重新认识与发扬。这两个根本性的转变给译学界提出了新的大问题:翻译在此转变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翻译在此转变中如何定位?翻译研究者应持有怎样的翻译观念?以研究“外译中”翻译历史与活动为基础的中国译学研究是否要与时俱进,把目光投向“中译外”的活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要向世界展示的是什么样的“中国文化”?当中国一改“五四”前后的“革命”与“决裂”态势,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在世界各地创建孔子学院、推广中国文化之时,“翻译什么”与“如何翻译”这双重之问也是我们译学界必须思考与回答的。

综观中华文化发展史,翻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翻译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表现尤为突出。从文化角度来考察翻译,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活动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其形式与内涵在不断丰富,且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联系,这种联系不是被动的联系,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重大力量,我们应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对

翻译活动进行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也基于对翻译的重新定位和思考,浙江大学于2018年正式设立了“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旨在“传承文化之脉,发挥翻译之用,促进中外交流,拓展思想疆域,驱动思想创新”。中华译学馆的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译的层面,推出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译丛,“译入”与“译出”互动,积极参与国家战略性的出版工程;在学的层面,就翻译活动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展开思考与探索,出版系列翻译研究丛书,举办翻译学术会议;在中外文化交流层面,举办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翻译家论坛,思想家、作家与翻译家对话等,以翻译与文学为核心开展系列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我们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合作,集合全国译学界的力量,推出具有学术性与开拓性的“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积累与创新是学问之道,也将是本文库坚持的发展路径。本文库为开放性文库,不拘形式,以思想性与学术性为其衡量标准。我们对专著和论文(集)的遴选原则主要有四:一是研究的独创性,要有新意和价值,对整体翻译研究或翻译研究的某个领域有深入的思考,有自己的学术洞见;二是研究的系统性,围绕某一研究话题或领域,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合理的研究方法、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以及较大的后续研究空间;三是研究的社会性,鼓励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选题与研究,如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研究、语言服务行业与译者的职业发展研究、中国典籍对外译介与影响研究、翻译教育改革研究等;

四是研究的(跨)学科性,鼓励深入系统地探索翻译学领域的任一分支领域,如元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批评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技术研究等,同时鼓励从跨学科视角探索翻译的规律与奥秘。

青年学者是学科发展的希望,我们特别欢迎青年翻译学者向本文库积极投稿,我们将及时遴选有价值的著作予以出版,集中展现青年学者的学术面貌。在青年学者和资深学者的共同支持下,我们有信心把“中华翻译研究文库”打造成翻译研究领域的精品丛书。

许 钧

2018年春

序

胡美馨教授把她的书稿给我并邀我作序,我欣然接受。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对胡美馨本人及其治学风格非常了解;二是她在此项研究从选题到成书的过程中,和我有过一些讨论,因此,我对她此项研究比较了解。我认识胡美馨已有二十多年,看着她从一名刚留校任教的新教师成长为一名颇有作为的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她既是我多年的同事,也曾是我的学生。我在浙江师范大学工作期间,目睹她孜孜不倦地投身外语教育改革、享受学术研究。她既善于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研究问题,更善于以科研成果反哺教学实践,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她都是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我也曾与她及其他同事一起开展精品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项目,她乐于兢兢业业地为团队、为单位默默奉献,是一位爱岗敬业、敏学善思的青年才俊,深受同事的尊重和学生的喜爱。胡美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是她的任课教师,也是她的硕士论文导师。在学期间她展现出的真诚的学术热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持续的钻研定力是同龄人中不多见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以硕士论文研究为基础,申报并获批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并在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近些年她肩挑课堂教学与行政管理双重担子,但从不松懈学术追求,取得可喜成果,作为她的老师、同事和朋友,我为她高兴,也感到自豪。

记得几年前,胡美馨和我谈该著作的选题时,我在充分肯定选题新意及学术价值的同时,提醒她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面对这一选题带来的挑战。她本科读的是英语专业,硕士读的是外国语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虽然她的古汉语功底比较扎实,但要深度融合外语学科与中国传统经学研究,对外语学科出身、未接受过经学研究专门训练的她来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胡美馨的这本著作从选题到出版历时十年,想必她一定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与挑战。可贵的是,胡美馨在挑战面前从不退缩,而是虚心向专家求教、潜心研读文献、不断突破自我,“十年磨一剑”,如今终成正果。

胡美馨的这一研究结合中国传统经学来思考中国经典外译的学术路向。中国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承载着中国文化思想传统因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典籍外译及其研究广受国内外学者关注。近些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推进、对文明互鉴重要意义的共识的不断加强,研究中国经典海外传播、探索有效传播路径更显重要,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现有研究或从西方译论视角评价已有典籍译本,或从翻译策略视角讨论具体翻译方法,或从批判话语视角解读其中的中西文化权势等问题,但很少有研究以中国传统经学中的经义及其话语建构特征为参照系,来考察现有中国经典外译实践、思考中国经典外译方法。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国内从事翻译研究、批判话语研究的学者大多来自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很少深度关注中国传统经学领域;而中国传统经学研究大多专注于古代经典的阐发诠释,很少深度关注经典的跨文化传播。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建构与传承发展主要通过两千多年的经学注疏传统得以实现;离开中国注疏传统来讨论中国经典外译,或许很难触及中国经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意义所在,也就很难深度把握传播的内容与方法。

胡美馨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重要问题，并以中国经典学术型翻译的成功案例——19世纪英国来华传教士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中的《关雎》译释文本为个案，分析理雅各中国经典跨文化诠释的经学话语特征、西方话语特征及其诠释效果，由此思考中国经典学术型外译的路向问题。她综合中国经学、翻译学、批判话语研究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将理雅各译释文本与中国传统注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理雅各的《关雎》译释具有以下特征：经注定位，经义之“神”与体裁之“形”兼具；文本辩读，“述而不作”与“述而又作”并举；中西兼顾，“传统注疏”与“现代语码”切换。胡美馨充分肯定理雅各的“西儒经注”策略与效果，也指出其西方话语特征影响了中国经义及其话语建构范式的跨文化表达。她讨论了全球话语单一性困境背景下中国经典“走出去”的当下意义，提出中国经典学术型翻译的路向建议：立足中国传统经学、文本辩读学术释译、兼蓄差异以参彼己、超越学科协同研究。这是一条独具特色的跨学科研究路径。就我所知，目前国内很少有像该著作这样的研究。

通读书稿后，我认为该著作至少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突出中国经典跨文化传播对全球话语多样性的意义。胡美馨提出，西方现代理性话语体系的长期霸权地位带来全球话语单一性困境，西方哲人对此虽有深入思辨，但难以在其体系内部寻求到突破这一困境的话语资源。中国经典及其注疏所蕴含的中国传统话语范式有别于现代理性话语，对全球话语多样性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可为当今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她站在全球话语多样性高度，思考中国话语传统的当下意义，体现出很好的问题意识。

其次，强调传统经学成果对中国经典学术外译的作用。胡美馨认为，中国经典及其注疏所承载的经义及其意义建构的话语特征是中国经典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起点，学术型中国经典外译应立足于传统经学成果，将中国传统话语范式加以跨文化传递，并通过

恰当方式使其与西方文化话语有效对接,进一步打开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通中西的学术格局。

再次,融合经学、翻译学、批评话语分析等理论与方法。胡美馨综合论述了注疏作为中国经典的“地方性知识”、中国经典外译对全球话语多样性的意义、中国经典跨文化传播应深度翻译经典的“地方性知识”等理论观点,深入梳理了大量中国注疏与理雅各的跨文化注疏文本。其分析论证旁搜远绍、辨析入微,体现出跨学科视野与扎实的文本功力,也探索出一种中国经典跨文化传播的话语路径、典籍翻译与海外汉学研究的新方法。

该著作涉及传统经学、话语研究、翻译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涉及大量中国传统经典原文、传统注疏文献、传统历史文献等古汉语文本,对于外语学科的很多读者而言,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但作者流畅自然的语言定会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该著作的跨学科视角与研究方法对跨语言、跨文化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其研究成果可为中国经典学术外译提供借鉴,也可为其他文化内涵密集型文献传译带来启示。

洪 岗

2018年10月于杭州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001
第二章 文献综述	011
2.1 文化诠释视角下的中国经典翻译研究	011
2.2 对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的研究	013
2.3 话语与文化多样性研究	020
第三章 作为西儒经注的《中国经典》	027
3.1 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定位	027
3.2 西儒经注《中国经典》	035
3.3 《中国经典·诗经·关雎》作为研究对象	041
第四章 “地方性知识”“深度翻译”与经典跨文化诠释	052
4.1 从“地方性知识”到“深度描写”与“深度翻译”	052
4.2 注疏作为中国经典“地方性知识”	058
4.3 “深度翻译”与中国经典跨文化诠释	065
4.4 文本分析方法	066

第五章 西儒注疏之经义呈现：剪裁连缀	070
5.1 理雅各注疏体例	070
5.2 题解中的中国注疏引述	074
5.3 字词训诂中的中国注疏引述	079
5.4 名物释义中的中国注疏引述	087
5.5 理雅各“以史证《诗》”与中国注疏的互文	100
5.6 多声部赋格的注疏观点并呈	110
第六章 西儒注疏之经典论释：案语旁白	124
6.1 注疏者案语作为释义路标	124
6.2 中西互照下的文化差异论说	131
第七章 西儒注疏之西方话语特征	149
7.1 名物释义中的科学话语特征	149
7.2 “以史证《诗》”的现代史学话语特征	169
第八章 理雅各西儒经注的当下观照	194
8.1 经义“辨识”与“再生”的当下意义	196
8.2 经学话语对突破现代性话语困境的启发	198
8.3 西儒经注对中国经典跨文化传播的启示	204
第九章 结语	209
参考文献	214
附录一 理雅各《中国经典·诗经·关雎》注疏	231

附录二 理雅各《中国经典·诗经》之《周南》题解	240
附录三 理雅各《中国经典·诗经》主要注疏参考文献	243
索引	259
后记	265

第一章 导 论

中国经典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与载体,儒学经典尤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十三经注疏》整理工作委员会,1999:1)。围绕经典文本发展而来的中国传统经学建构了独特的经学价值体系,此价值体系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姜广辉,2005:1)。

这种经学话语体系有别于19世纪欧洲现代启蒙运动以来发展起来的“明晰和严格的学科分类”“明快的逻辑和清晰的条理”。在中国传统经学中,“文、史、哲、经济、政治这些在西方学术中有着严格分野的学科是整合在一起的”,“给了人们对事物的整体把握和感悟”,“使我们有可能进入事物的本源,掌握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朱杰人,2005:3)。这种经学传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他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世界话语多样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以降,这种传统话语言说方式虽在中国话语现代化过程中逐渐被削弱,但仍对中国当下话语实践产生着重大影响(吴宗杰、胡美馨,2010)。

由于话语体系问题,中国传统话语范式并不容易为西方所理解。多年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人多以现代学科语言体系来解释、呈现中国,这种话语体系也成为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文学、音乐、艺术等不同领域的中国人借以解释、呈现自身文化